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

郑刚, 吴娅鑫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作为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学术团体的主力军, 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创设与发展顺应了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该社成立后, 非常重视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 将其视为主要工作, 通过召开年会、创办《儿童教育》社刊、举办学术演讲、组织赴外考察等多种途径, 搭建起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桥梁。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 宣传了国外学前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最新动态, 更新了国人学前教育的理念, 推进了学前教育的实践发展, 提升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影响力。

[关键词] 中华儿童教育社; 中外学前教育交流; 《儿童教育》; 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 G 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3) 01-0027-10

中华儿童教育社是近现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学前教育社团, 在近现代众多学前教育社团中, 该社率先树起教育交流的旗帜, 推动了近现代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既往研究中, 多数学者聚焦于“中华儿童教育社”“《儿童教育》杂志”以及陈鹤琴与中华儿童教育社关系等方面^[1-6], 对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研究少有问津。本文在分析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产生动因的基础上, 探讨其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活动的主要途径和内容, 总结其历史影响, 进而丰富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教育交流的相关研究, 以期为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中华儿童教育社及其开展教育交流的动因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患接连, 创钜痛深, 极大地震撼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 他们纷纷思考和找寻中国的出路。在教育领域, 一场“西学东渐”的思想启蒙运动悄然兴起, 使得欧美学前教育思想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 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诞生奠定了观念基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断深入, 各类教育社团发展壮大, 加上壬戌学制颁行等, 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

建立与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实践基础和适宜的制度基础, 也促使其后来成为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中流砥柱。

(一) 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建立与发展

中华儿童教育社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中国影响最大的学前教育社团。1926年12月, 陈鹤琴在南京筹设“幼稚教育研究会”, 主要目的是推动中国幼稚园现代化和推广儿童教育实验。入会的个人成员仅有10余人, 团体会员也仅有3个。次年, 该会的团体会员增加到10个, 并在陈鹤琴的带领下, 创办了《幼稚教育》月刊。1927年9月23日, 在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人的努力下, “幼稚教育研究会”改称“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 并将《幼稚教育》定为会刊。该会在陈鹤琴和其他创会者的推动下, 参会人员和组织规模不断扩大, 合作范围也逐步走出南京城, “以后逐渐扩大到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广州、北平等处”^{[7]33}。可见, 随着该组织影响力的扩大, “南京幼稚教育研究会”已不能满足当时学前教育发展的迫切需求, 急需建立一个全国性学前教育学术研究团体。1929年7月12日, 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西湖召开成立大会, 陈鹤琴被举荐为主席, 他十分欣喜地认为这是“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的好事”^{[8]259}。

[收稿日期] 2022-10-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幼儿教育思想传承与创新研究”(BOA140020); 华中师范大学“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CCN220010)

[作者简介] 郑刚(1976—), 男, 湖北武汉人,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中华儿童教育社以研究“儿童教育问题”为核心工作,受到了教育工作者的欢迎和支持,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社员李清悚回忆:“儿童教育社发展得很快,成立时只有47人、22个单位,1930年发展为315人、34个单位,1931年35个单位,1932年744人、39个单位,1935年1600多人,1937年近4000人”^{[9][121]}。在此期间,社内各类管理体制不断完善,制定社章、定期出版刊物、设置理事会、规定社员权利与义务、开办分社等,中华儿童教育社彰显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儿童教育社仍坚持召开年会、发行刊物和组织读书会等活动,使得社团在“八年之间,又增社员及分社甚多”^{[8][268]},并在儿童保育与教育方面做出了许多创举,例如开展学前儿童保教研究实验,创办活教育实验基地,发起学前儿童救济事业等,保障了学前教育能够在战时持续推进。1945年开始,中华儿童教育社受国民经济全面衰退、政局动荡的影响,各类社务未能恢复到之前盛况,后逐渐消亡。可以说,中华儿童教育社登上历史舞台,既顺应了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又反映了学前教育发展研究的内在规律,同时也开启了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新篇章。

(二) 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教育交流的动因

中华儿童教育社能够在中外学前教育交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是离不开当时国内外大环境的影响;二是离不开陈鹤琴、陶行知、李清悚、董任坚等社团领导人对社团开展教育交流的坚持不懈;三是社团自身对学前教育领域和现实问题的深入探索。

首先,开展教育交流是进一步促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需要。西方国家已经建立起各类学前教育组织或国际学前教育同盟会,而当时国内虽有很多小型学前教育团体,但缺乏能够活跃在国际舞台上、有组织性、代表性的学前教育学术团体。另外,国内有识之士对“教育救国”的强烈诉求,是诱发当时各个教育社团开展教育交流的最初动机。他们认为要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必须呼吁国人走出国门,与世界进行交流,才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基于此种情形,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正当其时。

其次,陈鹤琴、陶行知等社团领导人积极推动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杰出历史人物的推动作

用”^{[10][255]}。中华儿童教育社之所以能够蓬勃开展学前教育交流,与陈鹤琴、陶行知、李清悚等社团领导人的教育研究及实践息息相关。陈鹤琴是促成中华儿童教育社对外开展教育交流的核心领导者。他曾留学美国,目睹当时美国学前教育发达体系,深谙改变本国学前教育落后状况的迫切性,加之他对儿童的挚爱和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全力投入,都直接促使他推进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教育交流。他恳切地说:“我是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8][531]}。然而,中华儿童教育社要想顺利推进教育交流,并非陈鹤琴一己之力可以完成,必须有同道中人的支持才能保证该社重要事业的开展。陶行知、张宗麟、郑晓沧等发起者都与陈鹤琴一样,主张向先进国家学习,倡导新教育,改革旧教育。李清悚、董任坚、马客谈等三人则先后留学美、日等国,与陈鹤琴有着相似的留学体验,且他们思想活跃、目光长远,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教育交流尽心尽力。例如,李清悚和马客谈等人踊跃倡导组织国外儿童教育考察团;董任坚联合其他社员介绍国外学前教育的相关报道,并在《儿童教育》杂志上开辟了专门的国外儿教栏目。

再次,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是中华儿童教育社的重要任务。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创社之时就采用现代组织管理模式,建立起现代化的社团组织管理体系,并致力于构建广泛的内外关系网络,从而为社团开展教育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办社宗旨来说,该社一直坚持创社初衷,即“中华儿童教育社是纯粹学术研究机关,以研究小学教育、幼稚教育、家庭教育,注重儿童教育问题,供给材料”^{[7][33]}。正是在这一宗旨的引领下,社内众人以中国学前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极力主张中华儿童教育社要积极开展“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教育交流活动。

二、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教育交流的主要途径

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主要包括:召开年会、发行《儿童教育》社刊、开展社内外学术演讲、组织国外考察团、参加国际教育会议等形式。通过广泛开展中外教育交流,中华儿童教育社不断引进国外学前教育先进成果,促使本国学前教育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得到深入发展。

(一) 召开年会

召开年会既是中华儿童教育社发展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主要举措,也是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活动。1930年至1947年间,该社共举办十二届年会,为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做出巨大贡献。为发挥年会“促进研究进一步的组成”^[11]功能,该社成立时就特别强调:“本社社员是对于儿童教育有研究有兴趣的,不分任何界限,凡志愿加入的,均可入社”^[12]⁴³⁹。

秉持上述理念,社团召开的每届年会都聚焦当时学前教育领域的热点,吸引专业人士围绕“中心议题”展开研讨,进而推动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不断深入。1929年7月21日举行的社团成立大会上,陈鹤琴率先“将其平昔所得英美各国关于儿童教育方面之出版品一一出示会众”^[13],使众人感受世界教育潮流。1930年7月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董任坚以“儿童中心教育运动研究”为题,做了大会报告,梳理了洛克、卢梭、康德、克伯屈及杜威等人对于儿童中心教育运动的推动,指出“至于儿童中心教育之特征,并不偏重于教法教材或行政的片面改造,并不限于中小学,目下进步各大学之能力分组等,亦莫不受此影响”^[14]¹¹³。这次演讲使参会人士明晰了“儿童中心教育运动”演进的历史概况,把握了“儿童中心教育”的特质,为国内研究学前儿童教育的学者开启了全新的视角。1931年召开第二届年会时,中华儿童教育社邀请英、美、法、日等国学者前来赴会。美国学者柏来谛女士做了“低年级教学新趋势”的主题演讲,道出儿童的教育要明确“儿童是社会的动物,以活动为他的生活,故活动同呼吸有同样的重要”^[15]³⁹。日本学者坂本博士在演讲中介绍了日本初等教育的概况,强调现代化的教育应当是“打破论理的、形式的、呆板的教育,而建设实际的、有效的、合于人生的、适应人类需要的教育”^[16]³⁸,并且要“取消偏于知识而不合实际的教育,而主张具体的、实际的、人格化的教育”^[16]³⁸。可以说,外国学者的到来,一方面扩大了中华儿童教育社自身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社会人士前来参会;另一方面展示了其时国际学前儿童教育的最新趋势,更新了国人的思想观念。同时,中华儿童教育社搭建的交流平台使各国学者了解到中国学前教育领域的最新成就,提升了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国际学前教育领域的影响力。1932年于南京总部召开的第三届年

会则将“儿童健康问题”定为大会主题,此届年会并未邀请西方学者前来参会,但传播学前教育最新动态仍是重要内容。江本宽博士报告“美国儿童心理卫生之设施”,呼吁国人应重视儿童心理健康,并期望中国将来能“办理儿童心理卫生”^[17]⁶⁹。王祖祥调查对比中国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介绍欧洲在增加人口方面的两条途径“减低小孩死亡率,增加成人寿命”^[18]¹⁴。报告结束后,又由董任坚主持宣读许本震的论文《欧洲新学校》。参会人士听后认为“均有独到见解”,“听者无不动容”^[19]。至会议闭幕前,社员还向大会提交了“请于儿童教育杂志中辟一国际儿童教育消息栏案”的提案^[20]²¹。紧接着在第四届年会上,陈光潜先生再次重申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在世界各国均极注意。例如世界教育学会中有卫生教育研究,研究卫生教育师资问题、教育家本身之健康问题与儿童本身之营养问题”^[21]²⁷。随后陈剑恒、马客谈、李清悚和沈子善4人提出“请本社征求社友组织国外儿童教育考察团案”^[21]³³,将开展教育交流作为该社的重要事务。第五届年会上,程其保汇报赴欧考察的实际情况,尤其在儿童养护方面,“欧洲各国对于儿童养护,不仅限于初等教育阶段,在未入学以前的儿童,政府即予注意”^[22]¹⁰。罗廷光在论文《欧美初等教育综合观》中同样提及,“德国规定全国儿童,概入公共基本学校,受四年之强迫教育”^[23],并在他的《中国教育改造》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欧洲各国初等教育发展的趋势、教育制度、课程和他本人的教育研究结论。报告结束后,张宗麟、沈子善、张子陶等社员还就“中外儿童教育展望”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三人在各自分析了欧美各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最新动向后,都希望中国的学前教育事业能够与欧美各国积极交流学习,进而呼吁国内各界人士共同参与并重视起儿童教育。正如张子陶所说:“希望以政治力量注意儿童教育事业,希望以团体力量推进儿童教育事业,希望以专家力量研究儿童教育事业,希望家庭学校社会合力改进儿童教育事业”^[24]²²。第六届年会特别统计了儿童教育考察团成立后赴外考察的社员人数,前后共达七八十人。此外,相比前几届年会,第六届年会在社务管理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中外教育交流的内容和途径:首先,该社决定加入国际教育同盟,密切同国际教育组织的联系,并指派陈鹤琴和罗廷光负责与国际教育同盟会“交换意见,事

从联络”；其次，该社参考国外学术交流办法，创设书报流通部，主要负责收集世界重要儿童书报、世界著名儿童教育杂志和儿童读物等；再次，该社继续组织考察团赴外考察。受战争影响，1936 年之后的年会无法大规模召开，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对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活动受到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届年会后的几届年会虽未请外国教育学者前来参会，但此后的每届年会都报告了该社社员赴外考察的具体情况，这使年会对外教育交流的内容逐步由理论上升到实践，让每位参会人士感到“不虚此行”。

作为中华儿童教育社最为重要的活动，年会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教育交流的主渠道。传播先进学前教育思想，介绍国外学前教育的最新动态成为年会的重要内容。

（二）《儿童教育》杂志对国外学前教育的介绍

学术期刊是介绍教育发展的窗口，它促进了国外教育思想的引介和本土教育思想的争鸣，为教育学界提供了一个交流经验、借鉴学习的平台，对中

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25]213}。从某种层面上来说，《儿童教育》杂志的创办是中华儿童教育社推进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向更深、更广层次发展的重要体现。

该杂志的前身为《幼稚教育》，后因中华儿童教育社的成立，改为《儿童教育》，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份儿童教育专业期刊。诚如其介绍所言：“本刊为儿童教育社编辑，撰述诸君，均系实地研究儿童教育专家；其宗旨专在供给具体教材，讨论切实教法。故每期发表之文字，图画，歌曲，无一不于家庭，幼稚园小学校之实用，志高晓理论不着边际之刊物完全不同”^[26]。这一宗旨在《儿童教育》杂志办刊过程中得到全面落实。该杂志为了更便捷地介绍国外学前教育的最新动态，专门成立国外书报介绍部门，设立儿教新闻、世界儿教大事、中外儿教消息等栏目，主要报道欧美日俄等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儿童教育》在 1930—1937 年间共刊发有关国外学前儿童教育的文章数十篇（表 1）。

表 1 《儿童教育》介绍国外学前儿童教育部分篇名一览表（1930—1937）

| 时间 | 卷期 | 文章标题 |
|-------------|-------|--|
| 1928 - 1929 | 第 1 卷 | 《初期儿童教育》书报 |
| 1930 | 第 2 卷 | 《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文纳特卡制与儿童中心教育运动（附表）》《什么是“儿童中心教育”》《日本大阪集英小学幼稚生》《欧洲新学校》《儿童中心教育之趋势》《日本之儿童教育（一）》 |
| 1930 - 1931 | 第 3 卷 | 《日本之儿童教育》《木偶奇遇记之优点及其教学法》《苏俄幼稚园教育法》《什么是文纳特卡制》《华虚朋氏论训育》《文纳特卡学校的教学实况》《新教育之原理》《欧洲新学校》 |
| 1932 | 第 4 卷 | 《儿童中心教育的一个实例》《儿童中心教育的一个反响》《特殊儿童教育》《最近各国儿童教育的新进展》《美国儿童心理卫生之设施》《新教育的精神》《新教育与新心理学》《儿童特殊才能的研究》《新教育与新艺术》 |
| 1933 | 第 5 卷 | 《林肯学校的父母教育设施概况》《德克乐利新教育法评述》《关于儿童教育的重要英文书报》《莫斯科儿童戏剧院观戏的情形》《美国父母教育的发达》《关于欧亚各国教育的重要英文书报》 |
| 1934 - 1935 | 第 6 卷 | 《英国新育婴学校之设立》《澳洲儿童教育研究最近之新工作》《日本幼稚园教育联合会举行年会》《日本的儿童读物》《一个实施“全人类”的学校：东京成城学园（附表）》《墨西哥父母联合会之组织》《美国儿童教育社四十一届年会》《英国婴儿教育社夏令会》《创造的儿童剧》《日本儿童教育的特点与新动向（附表）》《国际联盟会与儿童》《南非洲新教育社会国际会议》《赴日参观一得》《英国教育会议》《国际家庭教育会议》《美国“教育周”》《英国婴儿教育社夏令会》 |
| 1935 | 第 7 卷 | 《欧美儿教新设施》 |
| 1937 | 第 8 卷 | 《苏、俄的学龄前期教育》 |

从表1可以看出,其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儿童教育》杂志刊发国外学前教育相关内容的论文和资讯不断增加,意味着该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趋势不断加强。其二,就该杂志报道世界学前教育的广度而言,其从最初报道美、英、日、俄几个国家学前教育的新动向,逐步增加到挪威、芬兰、澳洲、墨西哥和南非等国家的学前教育,表明该社已经搭建起沟通中西、联结国际学前教育学术交流的平台。其三,从该杂志刊登国外学前教育的内容上来看,其从学前儿童教育理论延伸到幼儿园、幼儿园教法、幼儿园设备、幼儿心理、幼儿读物和幼儿家庭教育等方面,突破了就“学前儿童教育”论“学前儿童”的桎梏,使得本国学前教育研究不断与国际化接壤,从而促进了中国学前教育研究向现代化迈进。

此外,在主动关注西方国家的学前教育的同时,部分国际教育组织也主动与该刊合作,加快了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步伐。《儿童教育》刊发不久,因其内容丰富,材料新颖,得到了国际新教育同盟的关注和认可。在1931年日内瓦召开的国际教育局会议上,有参会者发言:“由该会儿童读物研究社征集各国所出版之儿童读物。在会陈列俾众观览,亚洲方面日本出品独多,中国官厅并未应征。故陈列者仅有几本旧式教科书,颇为各国轻视”^{[27]11}。于是,该局主动与中华儿童教育社联络并达成协议,将《儿童教育》定为国际新教育同盟在中国的机关杂志,其目的是希望该社能代表国际新教育同盟征集中国各种儿童读物,以供他国儿童阅读。这一盟约的缔结丰富了近现代中国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内容和形式,不仅让更多的国人了解到国外学前教育的最新趋势,也让中国的学前教育成果有机会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中华儿童教育社将《儿童教育》杂志作为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媒介,不仅联络了中西教育,而且让国际教育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更引起国内社会的关注,促进本国学前教育学术研究的深化。

(三) 学术演讲对中外教育交流的宣介

学术演讲是传播新思想、促进学派间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华儿童教育社注重开办年会的同时,还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讲座,邀请社内外知名人士来社演讲,社员也主动赴外演讲,从而

为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开辟出新途径。

一是邀请社内社员演讲,旨在帮助社员不断更新学前教育思想。中华儿童教育社总社及各地分社都极为重视这项工作。南京总社开中华儿童教育社会内演讲之先河,将学术演讲与读书会相结合。吴增芥在读书会上讲到:“康健问题,做幼稚园教师的不能以为本问题太难就置之不理,而应加以切实的研究……美国 Los Angeles 学校最近出版幼稚生健康监护法(*Health Super vision of kindergarten Children*)一书,对于保持幼稚园儿童健康的办法,很可以供我们参考”^{[28]36}。上海分社紧随其后,陈鹤琴在介绍中华儿童教育社时提到:“上海社员读书会,每月开会一次,每次请社员一人或两人会内演讲儿童教育实际问题或介绍重要的书报”^{[7]34}。1931—1937年间,该分社共召开69次读书会,会上有关教育交流的内容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分享国外教育名著,以提高社员的理论素养。例如,社员们学习了*Child-centred School*、*Our Enemy, the Child*和*The Classroom Teacher*等教育著作^{[29]49};另一类是介绍国外学前教育的内容,分享国外学前教育新趋势给社员。例如“文纳特卡制的概况及与道尔顿制之异同”“学术教育的最近趋势及儿童读物的编法”“*The new Leaven*”^{[29]49}等主题。在南京总社和上海分社的引领下,其他分社也积极响应。1933年,程稚秋在南京分社成立大会上报告赴欧考察的情况,报告中介绍了欧洲儿童教育的设施,提出“欧洲近十年来因欧战关系,儿童数大为减少,故对于儿童十分重视,尤以新兴国家,如波兰、意大利、苏联等国均足使中国效法”^{[30]60}。1935年召开的苏州分社成立大会上,陈鹤琴被邀请作“现代欧洲的教育趋势”的演说。他“将英比意奥德俄法各国教育现状及特点一一介绍”^[31]。1937年,上海大夏分社规定社员可以“自由选读关于儿童教育的中外新旧书报”^{[32]114}。这种社内演讲的方式不仅增进了社员之间的情感联络,而且营造出浓厚的学术氛围,加强了社员对世界儿童教育核心问题的重视,从而推进学前教育的研究不断向更深层次发展。

二是邀请国外名人演讲。随着社员社内演讲会的广泛举行,中华儿童教育社及分社又在此基础上邀请国外名人来社演讲,从而推进了学术演讲的广度和深度。中华儿童教育社及各地分社曾邀请日本学者坂本、印度学者萨希·科尔、德国蓝完德博

士、美国学者泼莱司女士、华虚朋、惠勃女士、罗格及其夫人等前来作学术演讲。他们的演讲内容包括“日本初等教育”“新教育”“德国教育书报”“特殊儿童教育”“儿童中心教育”“儿童心理”“文纳特卡制”等。以1932年罗格及其夫人的演讲《新教育的精神》和《儿童中心教育的一个实例》为例。罗格在演讲中大致分析了世界各国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的教育将“儿童学习视为例行公事,完全不以儿童做中心”^[33]³。随后,罗格夫人对“儿童中心教育”作出进一步解说,“我们要承认儿童的个性,不能强迫他们做同样的学习……各个儿童依照个性的需要,同时个别地学习,各做不同的工作”^[34]⁷。罗格及其夫人的演讲从儿童教育的内容、方法、课程组成和原则几个角度出发,揭示出新旧教育的不同。为了进一步证实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二人还就儿童身心发展、儿童个性、幼儿园课程、儿童活动等方面,列举出大量实验或观察所得案例,从而希望中国能够发扬新教育的精神,让儿童能够获得圆满的生活。1933年,德国蓝完德博士在上海分社读书会上作报告《德国教育书报》,推荐教育类杂志 *The Nationaelsocialistische Lehrerzeitung*、*Deutsches Philologenblatt* 和 *Zeitschrift für Deutschkunde* 等,幼儿教育方法——佛罗培之幼稚园,教育类书籍《教育理想》《教育家精神与教育问题》和《品行意义与品行教育》^[35]⁴⁹,藉此呼吁教育同仁必须具备一心一意研究教育的精神,以“开创未来之光明”^[35]⁵²。这些名人的宣讲,适时传递出国外对于学前教育思想内涵的认知、学前教育研究深化的进程,以及在传播学前教育内容上所开拓的一些创新性研究方法。

三是社员赴外演讲。除了社内演讲和邀请国外名人演讲,中华儿童教育社社员还常被邀赴外演讲。例如,陈鹤琴多次受邀到各处演讲,利用这些机会,他积极宣传先进的学前教育理念与国外教育发展最新动态。1935年陈鹤琴应上海宝山教育局邀请,以“各国儿童教育趋势”为主题进行演讲。同年,他在暨南学校谈及“欧游感想”时,对英、德、俄等国的儿童学校教育、儿童社会教育、公民精神做了详细解说^[36]¹²。中华儿童教育社其他社员也曾多次赴外或通过电台播音等方式进行演讲。1932年,马客谈在中央广播电台上围绕“儿童中心教育”发表演说,演说内容依据中西学者对儿

童中心教育的研究和已有成果,概括出儿童中心教育实施的六大原则^[37]³⁷。1936年,杭市小学体育研究会邀请陈柏青分享“欧美各国近况”。一方面,这种赴外演讲的方式使参会者及时了解欧美各国学前教育的最新资讯,加快了现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这些社员的演讲内容呼应中国学前教育的现实问题,能够启迪国人,吸引了更多学前教育领域内外的人关注和重视学前教育。

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学术演讲活动,不仅有助于传递学前教育的新进展和新看法,而且对普及学前教育新思想、改善社会传统育儿观念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 组织赴外考察学前教育

中华儿童教育社加入新教育国际同盟时就发表声明:“却以为他山之玉可以攻错,特别在教育科学这样幼稚的时候,特别在我国教育又正在改革的时候,似乎我们更应该加入国际的组织,有机会和各国的新教育学者交换意见,合作研究”^[38]¹。因此,赴外考察是中华儿童教育社推动中外教育交流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1934年3月,中华儿童教育社组建国外教育考察团,派遣社员分赴欧美各国及日本等进行考察。该考察团将考察的第一站定为日本,前往考察的代表有杜刚、李清悚、周尚、沈百英、张咏春、王柱林、丁重宣等33位代表^[39],具体考察了日本学会、教育设施与儿童中心教育、教育制度和社会情况等^[40]。李清悚归国后在《儿童教育》上陆续发表了《日本儿童教育的特点与新动向》和《日本少年保护事业》。这两篇文章均提倡要重视儿童道德训育、公民教育以及发展儿童幸福保护等事业,培养儿童积极向上、享受人生幸福的态度。其他考察团员则就学前儿童教育相继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在日本参观考察的成果,如《日本的健康教育》《日本的儿童读物》《赴日参观一得》等文章。同年7月29日,陈鹤琴和马客谈二人受中华儿童教育社委托,赴欧洲考察各国儿童教育。1935年,陈鹤琴就此次考察专门作了报告,介绍了德国、波兰、苏俄等国学前儿童教育情况。他特别指出,欧洲国家都提倡组织儿童参加野外旅行或到工厂去参观,这“使他们多多和大自然接近,对于社会,将来很有益处”^[41]¹¹⁶,“皆使国民养成健全体格,使外人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欺侮”^[41]¹¹⁷。马客谈在《欧美儿童教育状况》中分别谈到英国的儿童健康

教育、美国的特殊儿童教育、俄国的儿童科学和艺术教育等,介绍了各国儿童教育的新设施以及最新教育成果,从而希望我国为发展学前儿童教育,养成儿童健全人格做出努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华儿童教育社的赴外考察被迫暂停。直至1948年,中华儿童教育社派遣陈其保、台振华参加第二次世界教育会议,恢复了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在会上,程其保参加了“各国教师及学生交换问题”“教师教学问题”和“健康教育问题”等主题的讨论^[42],有助于将西方先进的教师培养理念援引进中国,为国内幼儿教师培养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同时,利用赴外考察的机会,中华儿童教育社也逐步开始向西方各国展示中国学前教育的成就。1946年,马客谈代表中华儿童教育社前往美国参加世界教育专业会议,会上提交了有关世界儿童教育改造的方案^[43]¹⁷,得到大会的重视与采用。1948年,陈鹤琴代表中华儿童教育社表态,计划组织召开世界儿童互助会,“本会以推进儿童福利事业,发扬儿童互助美德,并以互谅互尊互助之精神,建立世界永久和平”^[44]¹⁴。中华儿童教育社以开放的眼光和包容的心态积极融入国际教育舞台,为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入推进了中国学前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本土化。

作为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学术团体的主代表,中华儿童教育社将学前教育专业人员汇聚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其成为该社研究和传播现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具体方式与途径,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加强

中华儿童教育社作为推动近现代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先锋,对中国学前教育事业产生了积极影响。该社以开放包容、实事求是的态度,引进和吸收国外优秀学前教育成果,促进中西融合,推动中国学前教育向现代化不断迈进,积累了学前教育国际化的初步经验。

(一) 宣传了国外学前教育的最新动态

清末民初,虽然已有幼儿教育团体陆续引入国外先进学前教育的理论和做法,但是这种宣介仅限于照搬和模仿,且宣传力度较小,推广范围有限。中华儿童教育社自成立后,就具有明确的社团定

位,致力于积极宣传国外学前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最新动态,努力为中国学前教育改革提供借鉴,从而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中华儿童教育社以多种形式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架起中外教育沟通交流的桥梁。其通过学术宣讲、刊译国外著名学前教育著作、延聘国外学前教育专家、组织国外考察团和参加世界学术会议等方式,打开了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新局面,使中国的学前教育能够更好地紧跟世界学前教育发展的步伐。第二,宣传了国外学前教育思想的新动态。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年会和学术演讲会上邀请欧美各国学者做主题演讲,在每期的《儿童教育》杂志上刊登欧美最新教育理论、教育趋势,例如“欧洲各国儿童的教育”“日本儿童教育的特点与新动向”“儿童中心教育的一个实例”“日本儿童的读物”等。这些新思想的涌入,一方面让整个社会重视起学前教育的价值与推广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使国人开始主动探索新思想与中国传统育儿理念融合的可能性。第三,介绍了国外学前教育发展的最新实践。中华儿童教育社通过社刊、读书会、展览会等方式,将欧美日等国的新式幼儿园课程、教法、教具及幼儿试验等及时引介到国内,以期国内教育界能够迅速掌握国外学前教育的最新动态,并有针对性地寻找出改良中国学前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二) 更新了国人学前教育的理念

清末民初,受“忠君、尊孔、尚武”等封建礼教思想影响,儿童的身心发展受到严重束缚。新文化运动在解放国人思想的同时,也掀起了教育改革的浪潮,为学前教育的发展带来新契机。在中华儿童教育社社员们的身体力行下,近现代中国开启了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新大门,“开眼看世界”,在传统学前教育观念中注入了现代教育的新理念。

首先,唤醒了国人重视学前教育的意识。中华儿童教育社在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中,引进了“儿童健康教育”“幼儿园教法”“儿童福利”“儿童心理”“父母教育”等理论,使国人从淡漠、忽视学前教育的传统观念中警醒过来,让儿童以“独立个体”的身份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学前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其次,中华儿童教育社巧妙化解了国外学前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育儿观之间的冲突。该社将年会和《儿童教育》杂志等作为使国人主动接受新理念的一个平台。例如,在年会上

展出国内外学前教育成果,在每期杂志上刊登的国内外热门学前儿童图画、故事、歌曲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学前教育新理念。这些理念深化了国人对学前教育的认识,呼吁国人要从儿童的视角出发,重视学前教育自身的价值,肯定学前教育对国家发展、民族独立和时代进步的重要意义。正如董任坚所说:“我们在过去的年会里,虽不敢说有什么大的贡献,至少引起了一般人对于儿童中心教育与民族本位教育的注意……至少引起了教育当局对于儿童读物和教科书的审查慎选”^[45]。再次,为解决国内学前教育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提供了有益参考。中华儿童教育社通过开展中外教育交流,邀请国外学者,集聚国内学前教育工作者、各界教育人士和其他关心教育的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对学前教育的现实问题进行探讨,集思广益,有效地解决了学前教育发展中必须面临的问题,例如“儿童中心教育怎样推进”“儿童中心教育应注意哪些方面”“幼儿教师问题”“如何推广国内儿童教育”“儿童读物如何编写”等。这些问题解答了普通民众对于学前教育的种种困惑,指导了学前教育的实践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国人主动接受和学习国外先进教育理念。

(三) 推进了学前教育的实践发展

中国儿童教育社在开展中外教育交流后,依靠社团本身庞大的关系网络和丰富的交流活动,在已有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了学前教育实践的新局面。

其一,推动了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华儿童教育社全面展开对外教育交流以来,不只是注重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和理论的研究,更热衷推行学前教育改革与试验。从幼儿教育的实施者到幼儿教师的培养者,从推翻旧观念到建立新的幼儿园课程标准和教学活动组织模式,从创办刊物到出版学前教育研究书籍,从吸收、改进本国传统学前教育到推动本国学前教育国际化,中华儿童教育社都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成就的取得与该社重视和推动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华儿童教育社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是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式,促进了近现代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其二,加强了同国际教育界的联系,提升了中国学前教育的影响力。中华儿童教育社自成立以来,在几位社团领导人的带领下,一直注重加强同西方各国教育界的联系,其中陈鹤琴作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主要领导人,依靠个人力量,屡次

邀请西方著名儿童教育专家来华访问,并请他们观摩中国学前教育的成果。同时,他也代表中华儿童教育社出席国际儿童教育会议,向世界展示中国学前教育的研究成果,纠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学前教育的固有偏见。社员李清悚、胡叔异、马客谈等人也先后带领考察团赴外考察,通过与国外从事学前教育的教师、学者面对面的交流与学习,加强了中国与各国之间跨文化沟通。其三,积累了推进学前教育国际化的有益经验。中华儿童教育社从建立到发展壮大,不断进行着国际化的探索,特别是几位社团领导人在观念上极为重视学前教育国际化,并将开展学前教育交流定为社团长远发展的重要使命之一。该社通过迎接国外同仁来访、派遣社员赴外考察、加入国际新教育同盟等方式,在引进西方学前教育新理念和介绍中国教育状况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学前教育交流与合作。此外,该社还凝聚了一批高水平且具有国际交流经验的人才,为社团开展学前教育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

历史地观察,中华儿童教育社在中外教育交流中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历史局限:一是时局不稳、战争不断,导致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时断时续;二是社团经费有限,无法为开展中外学前教育交流提供持续的经费支持和充足的物质保障;三是社团内部没有建立起一支推进中外学前教育交流的稳定队伍和固定机构,缺乏有效的工作机制,使得这项重要事务受外界影响较大,时废时兴。新时代下的学前教育交流应吸取前人经验,在具备国际视野的同时,扎根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打造对外教育交流的新模式,使我国学前教育不断向高质量、高层次、高水平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冉冉. 陈鹤琴与“中华儿童教育研究社”[J]. 幼儿教育, 1985 (12): 10-11.
- [2] 田景正, 张建国. 略述近代以来中国学前教育团体的贡献及启示[J]. 学前教育研究, 2003 (09): 32-34.
- [3] 贺鹏丽. 中华儿童教育社的社务活动及其当代价值探析[J]. 福建茶叶, 2019 (10): 221-222.
- [4] 贺鹏丽, 中国昌. 中华儿童教育社与中国儿童教育现代化[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09): 157-159.
- [5] 郭景川, 中国昌. 民国时期儿童教育学人的教育交往

- 空间——以陈鹤琴及中华儿童教育社为考察中心[J]. 学前教育研究, 2018 (09): 19-26.
- [6] 高振宇. 民国时期儿童学研究者群体分析及对当代的启示[J]. 新儿童研究, 2020 (00): 43-69.
- [7] 陈鹤琴. 中华儿童教育社概况[J]. 儿童教育, 1932 (10): 33-34.
- [8] 陈秀云, 陈一飞. 陈鹤琴全集: 第6卷[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268, 531.
- [9] 张礼永. 中华儿童教育社简史(1926-1950)——儿童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的炼成[J]. 基础教育, 2012 (3): 118-122.
- [10] 刘小红. 中华儿童教育社史[M]. 重庆: 西南大学出版社, 2020: 255.
- [11] 董任坚. 本社成立之后, 便有年会[J]. 健康教育: 中华儿童教育社年刊, 1934 (1): 1.
- [12] 余择生. 本社在杭开成立大会经过情形[J]. 儿童教育, 1928 (3-10): 439-444.
- [13] 佚名. 全国儿童教育社成立会[N]. 申报, 1929-7-15 (11).
- [14] 佚名. 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一届年会纪要[J]. 湖北教育厅公报, 1930 (7): 112-116.
- [15] PRENTICE M, 庞国樑. 低年级教学的新趋势[J]. 儿童教育, 1931 (8): 39-40.
- [16] 坂本, 庞国樑. 日本初等教育[J]. 儿童教育, 1931 (8): 37-38.
- [17] 江本宽, 何尔超, 查寿洪. 美国儿童心理卫生之设施[J]. 儿童教育, 1932 (10): 67-69.
- [18] 佚名. 南京市卫生事务所所长王祖祥君致词[J]. 儿童教育, 1932 (10): 14.
- [19] 佚名. 中华儿童教育社年会第一日[N]. 申报, 1932-11-12 (10).
- [20] 佚名. 第一次会议纪事[J]. 儿童教育, 1932 (10): 17-27.
- [21] 丁重宣. 参加中华儿童教育社第四届年会报告[J]. 教育周刊, 1933 (173): 22-35.
- [22] 程其保, 程宗宣. 欧洲的初等教育[J]. 江西教育旬刊, 1933 (6/7): 6-11.
- [23] 罗廷光. 年会论文[N]. 新闻报, 1934-7-10 (16).
- [24] 罗廷光, 沈子善, 张子陶. 社员对于中外儿教的展望[J]. 儿童教育, 1934 (3): 19-22.
- [25] 侯怀银. 民国教育学术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8: 213.
- [26] 佚名. 本刊归开明书店发行广告[N]. 申报, 1930-11-11 (05).
- [27] 佚名. 日内瓦教育局委托中华儿童教育社征集读物[J]. 华东教育, 1931 (26): 11.
- [28] 吴增芥, Los Angeles 学校. 幼稚生健康的监护[J]. 儿童教育, 1929 (2): 36-39.
- [29] 沈百英. 儿童教育社上海分社社员读书会会务概况[J]. 儿童教育, 1931 (8): 49-50.
- [30] 佚名. 本社南京分社成立大会纪要[J]. 儿童教育, 1933 (5): 60-61.
- [31] 佚名. 苏州即将成立分社[N]. 新闻报, 1935-4-1 (14).
- [32] 佚名. 上海分社大夏社友读书会[J]. 儿童教育, 1937 (1): 112-114.
- [33] RUGG H O, 陈鹤琴, 马静轩. 新教育的精神[J]. 儿童教育, 1932 (5): 1-5.
- [34] RUGG H O, 陈鹤琴, 马静轩. 儿童中心教育的一个实例[J]. 儿童教育, 1932 (5): 6-9.
- [35] 蓝完德, 葛鲤庭. 德国教育书报[J]. 儿童教育, 1933 (10): 48-52.
- [36] 佚名. 陈鹤琴先生演词: 欧游感想[J]. 暨南校刊, 1935 (134): 1-3.
- [37] 马客谈. 中央广播电台播音: 儿童中心教育[J]. 儿童教育, 1932 (10): 36-38.
- [38] 董任坚. 加入新教育国际同盟[J]. 儿童教育, 1933 (9): 1.
- [39] 佚名. 中华儿童教育社赴日考察团今日返沪[N]. 新闻报, 1934-4-24 (12).
- [40] 佚名. 中华儿童教育社赴日考察团今日返沪[N]. 申报, 1934-4-24 (14).
- [41] 陈鹤琴, 朱家华. 游欧的几点感想[J]. 光华大学半月刊, 1935 (8): 116-117.
- [42] 佚名. 世界教育专业会议将讨论“教师宪章”[N]. 申报, 1948-6-27 (6).
- [43] 马客谈. 追记世界教育专业会议[J]. 世界月刊(上海1946), 1947 (10): 17.
- [44] 佚名. 陈鹤琴组世界儿童互助会[J]. 四川教育通讯, 1947 (25): 14-15.
- [45] 董任坚. 年会回顾[J]. 儿童教育, 1933 (6): 1-3.

(责任编辑: 容媛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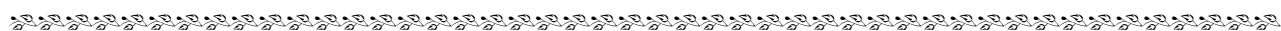
Chinese Children's Education Association and Sino – foreign Preschool Education Exchanges

ZHENG Gang, WU Ya – xin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As the main force of Chinese modern preschool education academic group,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s education society conforms to the objective nee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The Chinese Children's Education Associa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e – school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t has built a bridge for pre – school educatio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by holding annual meetings, founding the “Children's Education” social journal, holding academic speeches, organizing foreign delegations, and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s. The China Children's Education Society has carried out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chool education, publicized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foreign preschool education thoughts and educational practices, updated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promoted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preschool education and enhanced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reschool edu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children's education society;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chool education exchange; *Children's Education*; historical impact



我校研究生在全国“田家炳杯”教学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近日，由“田家炳基金会”冠名、全国教育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主办的 2022 年“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决赛获奖名单陆续公布，我校在语文、数学、英语、思政学科教学及小学教育 5 个领域选派了 24 名教育硕士研究生参加大赛取得优异成绩。

其中，来自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的罗鹏同学和师范学院的林晓琳同学分别在学科教学（语文）和小学教育领域的教学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此外还有 3 人获二等奖，4 人获三等奖，2 人获优秀教学设计奖，张哲英、陈文胜、张海燕、许文君、杨柳夏等 5 位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获奖层次和获奖数量创我校历史新高。

“田家炳杯”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技能大赛是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认定的唯一一项国家级教育硕士教学技能竞赛，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学科最全、影响力最广的教学技能赛事，以“学高”“身正”“技精”为核心理念，旨在加强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实践能力的提升，促进培养院校之间相互交流学习、共同发展，培养具有高尚师德、先进教学理念、扎实教学技能的优秀教师后备力量。

我校高度重视“田家炳杯”研赛工作，各有关学院从初赛的选拔、赛前培训和专家指导等方面均做了精心的策划和部署，克服困难进行了多次模拟训练，反复打磨教学设计和讲课稿，不断完善参赛教学视频。此次取得的优异成绩，充分展示了我校教育硕士研究生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教学技能和良好的综合素质。

（文：付小科/编辑：宣传部）